

VLADIMIR NABOKOV

说吧，记忆

我们这个时代纪传体
作品的扛鼎之作。



纳博科夫自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纳博科夫自传

说吧，
记忆

陈东飙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SPEAK MEMORY

Copyright © 1967 by Vladimir Nabokov

© 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和 Smith/Skolnik Literary Management 代理由 The Estate of Vladimir Nabokov 授予全

球中文版独家专有出版权。

吉权图字：07—1997—114

说吧，记忆

作 者：[美] V. 纳博科夫 译者：陈东飏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二道达森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31 千字

印 张：10.25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 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176—7/I·1128

定 价：15.80 元

我们这个时代纪传体作品的扛鼎之作。

新共和报

给 薇拉

前 言

本书是一组相互间有系统联系的个人回忆集，它在地理上从圣彼得堡延伸到圣纳泽尔，覆盖三十七个年头，从1903年8月到1940年5月，只有不多的一点突进到以后的时空。引发了这一系列的那篇文章对应于现在的第五章。三十年前在巴黎，我以“Mademoiselle O^①”为题用法语写下了它，让·保朗把它发表在*Mesure*^② 1936年第二期上。一帧照片（最近发表在季赛勒·弗鲁恩的《詹姆斯·乔伊斯在巴黎》中）纪念了这件事，只是我被误指为（在围着一张花园石桌休憩的*Mesure*同仁中间）“奥迪贝尔蒂”了。

在我于1940年5月28日前往移居的美国，“Mademoiselle O”由已故的希尔达·沃德译成英语，由我修订，又由艾德华·威克斯发表在《大西洋月刊》（它也是第一份刊印我在美国写作的小说的杂志）1943年1月号上。我与《纽约人》的合作是（通过爱德蒙·威尔森）以1942年4月

① 法语“O小姐”。——译注（以下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② 法语“尺度”。

的一首短诗开始的，继而是几篇即兴作品；但直到1948年1月3日那里才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散文创作：这就是《我舅父的肖像》（全书的第三章），1947年6月写于科罗拉多州埃斯蒂斯帕克的科隆比纳洛奇，倘不是哈罗尔德·罗斯与我往昔的幽灵如此相投的话，我妻子、孩子和我是不会在那里又待了很久的。同一份杂志也发表了第四章（“我的英语教育”，1948年3月27日），第六章（“蝴蝶”，1948年6月12日），第七章（“科莱特”，1948年7月31日）和第九章（“我的俄语教育”，1948年9月18日），均写于麻州剑桥，在一个精神与肉体都面临巨大危机的时期，以及第十章（“揭幕人”，1949年1月1日），第二章（“我母亲的肖像”，1949年4月9日），第八章（“幻灯”，1950年2月11日；H. R. 的疑问：“纳博科夫家是个一把胡桃夹子的家庭吗？”），第一章（“完美的往昔”，1950年1月17日），均写于纽约伊撒加。

余下的三章里，第十一章和第十四章发表于《党人评论》（“第一首诗”，1949年9月，和“流亡”，1951年1—2月），而第十三章则给了《哈泼斯杂志》（“三一巷的寄宿舍”，1951年1月）。

“Mademoiselle O”的英语稿再次发表在《九故事》（新方向，1947年）和《纳博科夫十二篇》（双日，1958年；海涅曼，1959年；大众书局，1959年；以及企鵝丛书，1960年）里；在最后那个集子里，我还收进了《初恋》，它成了选家偏爱的一篇。

尽管我是以上述的初版日期所反映的古怪次序来写作这些章节的，它们一直整齐地存放在我头脑中编了号的空格里，

遵守现在的章节顺序。那顺序在1936年，在放置基石时即已确定，这块基石在它隐秘的空洞里容纳了各种地图，时间表，一套火柴盒藏品，一片深红色玻璃，甚至——我现在认识到——我阳台前的日内瓦湖风景，它的涟漪和光耀的空白，如今在饮茶时分，那里游荡着着羽毛簇簇的鸭子，如黑斑点缀其间。因此我毫不费力地装配起了一本由纽约哈帕兄弟公司出版于1951年的书，书名是《决定性证据》——我存在过的决定性证据。不幸的是，这个短语暗示了一个探案故事，我就计划把英国版题为《说吧，摩涅莫绪涅^①》但被告知“小老太太们不会想要一本她们读不出书名的书。”我也曾经玩味过《忍冬饰》，这是一种由精美的交错图案和展开的花簇组成的金银花装饰物的名字，但没有人喜欢它；于是我们最终决定了《说吧，记忆》（戈朗兹，1951年，和纽约世界书局，1960年）。它的译本是：俄文本，作者译（*Drugie Berega*，契诃夫出版社，纽约，1954年），法文本，伊沃内·达维译（*Autres, Rivages*，加利玛尔，1961年），意大利文本，布鲁诺·奥代拉译（*Parla, Ricordo*，蒙达多利，1962年），西班牙文本，海麦·皮涅罗·贡萨雷斯译（*iHabla, memoria!* 1963年）和德文本，迪特·E. 齐默尔译（罗沃尔特，1964年）。这就是书目方面的全部必要资料，神经紧张的批评家们曾恼怒于《纳博科夫十二篇》书末的注释，这次将会，我希望，在本书的开头被催眠而认可它们。

在美国写作第一个稿本的时候，我所遇到的障碍是几乎

① Mnemosyne，记忆女神。

完全缺乏有关家族历史的资料，以及因之而来的，在我感到我的记忆或许有错时，不可能核对它们。我父亲的传记如今已经得到扩充和修订。许多其它的修改和补充也已作出，尤其在较早的章节里。某些紧密的括号已经打开，得以满溢出它们仍旧富有活力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叙述一个重要事件时仅仅作为一个随意选中的模型，而没有事实上的意义的一件物品，每当我在修改各种版本的校样的过程中重读那一段时，则总是给我制造麻烦，直到我最后尽了最大的努力，那独断的眼镜（摩涅莫绪涅肯定比其他人更需要它）才蜕变成了一个清晰地记忆起来的牡蛎形烟盒，闪烁在 Chemin du Pendu^① 的一株白杨树下的草丛中，在 1907 年那个 6 月的日子，我曾在那里发现了一只在此遥远的西方难得一遇的天蛾，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我父亲也在那里网住过一只在我们的北方林地罕见的孔雀蝴蝶。

1953 年夏，在靠近亚利桑那州波特尔的一座农场里，在俄勒冈州阿什兰的一幢租来的房子里，在西部与中西部的各个汽车旅馆里，我设法在捉蝴蝶和写作《洛莉塔》与《普宁》之间，在我妻子的帮助下，把《说吧，记忆》译成俄文。由于对重新展开我在 *Dar*（《天赋》）中苦心经营的主题存有心理上的困难，我删去了整整一章（第十一章）。另一方面，我修订了许多段落并试图对原作健忘的缺点有所动作——空白点，模糊的地带，微暗的范围。我发现有的时候，以高度专注的方法，中立的污斑可能会被迫成为美丽的焦点，于是

① 法语“吊死者之路”。

突如其来的景象就会被指认，无名的仆役就会得到名字。对于《说吧，记忆》眼前的这一个最后的版本，我不仅在最初的英语文本里引进了基本的改变和丰富的补充，而且利用了我在把它译成俄文时作出的修正。对原先的俄国记忆进行一次英语重述，再将它译回俄语，此刻又使之重归英语，这被证明是一项恶魔般的使命，但给予我某种安慰的是想到这样一种为蝴蝶所熟知的多次蜕变，以前还从没有任何人尝试过。

在一场回忆——其拥有者和牺牲者本来绝不会试图成为一位自传作家——的反常事例里，最糟糕的是在回溯中把我的年龄与这个世纪的年龄等同起来的倾向。这在本书最早的稿本中已经导致了一系列具有惊人一致性的年代学错误。我生于1899年4月，在比如说1903年的三分之一时自然是大约三岁；但在这一年的8月，那向我显示出来的鲜明的“3”（像在“完美的往昔”中描述的那样）指的将是这个世纪的年龄，而不是我的，我的是“4”，像一只橡皮枕头一样方方正正，富有弹性。同样，在1905年的初夏——我开始搜集蝴蝶的那个夏天——我是七岁而不是在第6章灾难性的第二节里所说的六岁。摩涅莫绪涅，必须承认，已经表明是个十分粗心的姑娘。

所有的日期都以新法来表示：我们在十九世纪落后于文明世界的其它部分十二天，在二十世纪初则是十三天。根据旧历，我生于上世纪最后一年的4月10日，黎明，而在比方说德国，那就是（倘若我能够被一下子带过边境）4月22日；但是由于我所有的生日都是以递减的盛况在二十世纪庆祝

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因革命和侨居而从儒略历变更到格里高利历时，通常都在4月10日上增加十三而不是十二天。错误是严重的。有什么办法呢？我发现在我最近的护照里“出生日期”下面是“4月23日”，那也是莎士比亚、我的侄子弗拉基米尔·希科尔斯基、雪利·邓波儿和哈塞尔·布朗（此外他还与我合用一份护照）的出生日期。于是，这就成了难题。计算的笨拙阻止了我解决它的企图。

阔别了二十年后，当我乘船回到欧洲时，我重新系起了甚至在我离开之前就已经松开的纽带。在这些次全家的重聚中，《说吧，记忆》受到了判决。日期与环境的细节被加以核对，还发现在许多事例里我弄错了，或是没有足够深入地检验一段模糊然而能够彻底了解的回忆。某些材料被我的建议者作为传说或谣言删去了，或者，倘若真是如此的话，有证据表明它们所关联的并不是脆弱的记忆将它们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事件与时期。我的表兄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纳博科夫给了我关于我们家族历史的难以估价的资料。我的两个妹妹都生气地抗议我对比亚里茨之行的描述（在第七章开头），向我投掷具体细节来使我相信我将她们撇在后面（“和保姆阿姨们在一起！”）是错误的。我因为缺乏具体的文件证明而无法重新处理的东西，如今我更乐意为了彻底的真实而把它们删去。另一方面，有关祖先与别的显要人物的许多事实也显露了出来，并被编入《说吧，记忆》的这一最后改写本。我希望有一天写一本“说下去，记忆”，覆盖1940—60年在美国度过的时光：某些挥发物的升华与某些金属的熔化仍然在我的线圈与坩锅里进行着。

读者将在本书中找到我的小说的零星参考资料，但总而言之我感到写下它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它们应当保留在最初的胃口中。我最近为 *Zashchita Luzhina*, 1930 (《防御》，普特南，1964 年)，*Otchayanie*, 1936 (《绝望》，普特南，1966 年)，*Priglasenie na kazn'*, 1938 (《斩首的邀请》，普特南，1959 年)，*Dar*, 1952，连载于 1937—38 年 (《天赋》，普特南，1963 年)，*Soglyadatay*, 1938 (《眼睛》，费德拉，1965 年) 的英译本写作的引言对我在欧洲的往昔的创作部分提供了一个足够详尽而又生动的叙述。至于那些乐意要一份有关我的出版物的更完备书单的人，有一份详细书目，制作者是迪特·E. 齐默尔 (*Vladimir Nabokov Bibliographie des Gesamtwerks*)^①，罗沃尔特，1963 年 12 月第一版；1964 年 5 月第二修订版)。最后一章中的两步棋由利普顿，马修斯与赖斯书局重新发表于《象棋难题》之中 (费伯，伦敦，1963 年，252 页)。然而，我最有趣的发明是一个“白子后撤”的难题，我把它献给了 E. A. 芝诺斯科—波洛夫斯基，他曾在 1930 年代 (1934 年?)，将它发表在巴黎的流亡者日报 *Poslednie Novosti*。我对棋子位置的记忆没有清晰到足以把它记在这里，但也许某个“奇幻象棋”的爱好者有一天会在那些受到祝福的图书馆中的一家查阅它们，在那里旧报纸都被缩微摄制下来，我们所有的记忆也应当如此。评论者阅读第一稿比他们将要阅读的这个新版本更粗心一些：他们中只有一位注

① 德语“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品总目”。

意到我在第八章第2部分的第一段里“恶毒地咬”了弗洛伊德，更没有一个人发现第十一章第2部分的最后一句里有一位大漫画家的名字以及对他的赞美。一个作家最为尴尬的莫过于要自己来指出这样的事了。

为了避免伤害生者或烦扰死者，某些真名实姓被改掉了。这些名字都在索引中以引号区分开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我的方便而列出一些与我的往昔有关的人和主题。它的出现将恼怒粗俗者但会令眼光锐利者满意，如果仅仅因为

从那索引的窗口

攀上一枝玫瑰

而有时一阵轻风 *ex*

Ponto^① 吹来。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1966年1月5日

蒙特勒

① 拉丁语“从船上”。

第一章

1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尽管两者是相似的双胞胎，人看出生以前的深渊，通常比看他（以每小时大约四千五百下心跳）前往的那个更镇静一些。然而，我

知道有一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恐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他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于此，也没有人会为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告别。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相反的事件过程里，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这样的幻想年轻人并不陌生。或者，换一种说法，最初与最后的事物经常倾向于拥有一种青春期的特征——除非，有可能，它们为一种可敬而严格的宗教所指引。自然期望一个发育完全的人接受两个黑色的虚空，前面的与后面的，像他接受两者之间的奇异梦境一样若无其事。想象，永生者与不成熟者的至高乐趣，应当受到限制。为了享用生命，我们不当过更多地享用它。

我反抗事物的这种状况。我感到了这一冲动，要把我的反抗释放出来，警戒自然。一次又一次，我的头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辨认我的生命两端非个人的黑暗中最微弱的个人的闪光。黑暗仅仅是那道时间之墙造成的，它把我和我青肿的拳头与一个没有时间的自由世界分隔开来，这是我乐于同浑身涂抹得俗丽之极的野蛮人共有的一个信条。我曾在思想中返回——我返回时思想毫无希望地越来越窄——到遥远的地带，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出口，最终仅仅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环形的并且没有出路。除了自杀，我什么都试过。我

曾脱去我的身份，以便把自己当作一个司空见惯的幽灵，并潜入我出生之前即已存在的国度。我曾在心中忍受过维多利亚时代女小说家和退休中尉的自暴自弃的陪伴，他们记得前生曾经是罗马大道上的奴隶信使或是拉萨柳树下的先知。我曾经翻乱了我陈旧的梦境，寻找钥匙和线团——同时我要说我彻底抛弃了弗洛伊德的那个粗俗、杂乱、根本上属于中世纪的世界，还有它对性符号的古怪之极的寻觅（仿佛在莎士比亚作品里寻找培根式的离合诗）和它嫉妒的小胚胎，它们在那天然的藏身之所，窥视着它们父母的爱情生活。

最初，我没有觉察到，初看之下如此无边无际的时间，是一个监狱。在探查我的童年（仅次于探查一个人的永恒）之际我看到意识的觉醒像一连串互相分隔的闪光，它们的间隔渐渐缩短，直到形成了感觉的大块光域，给予记忆一个湿滑的立足点。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多少是自发地学习识数和说话，然而我是我而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这一内心的知识则似乎是在以后，当我得知他们相对于我的年龄，并把这一发现与之直接联系起来的时候才得到了确立。当我想到那显现，强烈的阳光就立刻透过层层叠叠的翠绿图案侵入我的记忆，打上肺叶形的日斑，从这一点来判断，那一次也许就是我母亲的生日，在残夏，在乡村，我曾经提问和估价我所得到的回答。这一切根据摘要重述的原理，都是理所当然的那样；在我们最为遥远的祖先的头脑中自省意识的开端必定是与时间感的显露同时到来的。

就这样，当我自己的年龄刚刚揭开的，新鲜而整洁的方程式，四岁，与我父母的方程式，三十三岁与二十七岁，对

应起来时，某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我获得了一次极为鼓舞人心的震动。仿佛在接受第二次洗礼，在比十五个月前一位咆哮不已，淹得半死的半胜利者所举行的希腊正教洗礼（一种旧习俗吩咐我父母藏在门后，我母亲通过那扇半掩的门，设法纠正弄得一团糟的驼背长老，康斯坦丁·维特文尼茨基神父）更为神圣的仪式中，我感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种光辉而易变的介质，那正是纯粹的时间因素。一个人与芸芸众生分享它——就像兴奋的沐浴者共享闪亮的大海——他们并非他自己，但是将他们连成一体的是时间的共同之流，一个与空间世界截然不同的环境，不仅人而且猩猩和蝴蝶也能够感觉到它。在那一瞬间，我深深地察觉到，那抓住我右手的，一身轻柔的白色与绯红色的二十七岁生命，就是我的母亲，而那抓着我左手的，一身坚硬的白色与金黄色的三十三岁生命，就是我的父亲。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并肩前行之际，我昂首阔步，又奔跑起来，又再次昂首阔步，踏过一块块阳光的斑点，沿着一条小路的路心走下去。如今我轻易就将它与我们在旧时俄国圣彼得堡省份的乡间地产维拉庄园中的一条有装饰性矮栎树的小径认同为一。事实上，从我遥远、孤单、几乎未曾居住过的时间在当今的界限，我看见我微小的自我，在1903年那个8月的日子庆祝感觉生命的诞生。倘若那握住我左手的人和握住我右手的人在我模糊的童年世界里曾双双在场，他们是在一位隐姓埋名的照料者的面具下出现的；但此刻我父亲的军装，骑兵卫队辉煌夺目的制服，胸甲上光润的金色波涛在他的前胸和背脊燃烧，像太阳般呈现，而此后的两三年里，我一直对我父母的年龄保持着浓厚的兴趣，